

# 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 一个嵌入性视角

胡万进 童 星

**摘 要** 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政府治理必须超越传统的“左与右”之分,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更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入手,对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再解读,提倡一种“嵌入式”的结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

**关键词** 治理;变革;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2)02-0065-06

**作者简介** 胡万进: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93;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如果同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判断:“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sup>①</sup>,那么现代人在经历了社会分化、经济合理化、生存变化三个巨大调整后,整个世界踏上了一条现代性的不归路。<sup>②</sup>我们能够看到启蒙运动以降,尤其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仿佛进入了一个万花筒时代,形形色色的思潮风起云涌,纷纷出笼: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凡此种种“主义”均是对现代性做出的诊断与回应,撇开内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之争不谈,单从公共行政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其基本指向可以约略分为“左”与“右”,并且倾向于“右派”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一直被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徒们奉为圭臬。<sup>③</sup>然而吊诡的是,右派市场神话的破灭其实早就隐藏在“斯密悖论”之中了,他们忘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同样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受欢迎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sup>④</sup>

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庄严宣告了自由市场主义的失败,并引发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激进主义者建起了全能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改良主义者则衷情于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但进入198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使人们认识到完全的国家管制是行不通的,同时过度的福利成本亦使“福利国家”日益难以维系,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遂卷土重来,但是新右派“扭曲的个人主义”(twisted individualism)因破坏了社会团结纽带而注定难以持久,公共行政学从理论到实践似乎将要陷入历史循环之中。

## 一、从统治到治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值此关键时刻,吉登斯及时发出了“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的号召,积极主张走“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具体而言,他先

是从理论上对左右之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这个世界上,旧的左派教条已陈旧不堪,新的右派思想苍白无力,第三条道路才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主的凤凰涅槃”、“必须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sup>⑤</sup>接着,吉登斯提出了重构政治认同基础的六点框架,包括:左派以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代替解放政治,降低其激进性;右派以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取代自由民主,重建社会团结;以能动性政治打通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界限和藩篱;以积极福利代替福利依赖,重建福利体系等。<sup>⑥</sup>随后,吉登斯正式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包括:无责任即无权利的价值观、积极的公民社会、新型的混合经济、包容性(inclusion)的发展、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等。<sup>⑦</sup>

近年来风靡公共行政学界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登上学术舞台的。一般认为,该术语最早出现在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非洲的“治理危机”,并提出“良好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世界银行1992年的年度报告也是以“治理与发展”为题的。<sup>⑧</sup>但公正的说,“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sup>⑨</sup>,并且“治理一词像目前关于发展问题辩论中的其它许多概念一样,被许多大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群体用于各种不同的、常常是互相冲突的目的”<sup>⑩</sup>,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sup>⑪</sup>

最常见的分歧是关于“治理”与“统治”(governing)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学术界大体上有四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二者区别不大,“治理”只不过是“统治”为了顺应形势而换了种委婉的说法。胡德(Christopher Hood)就曾尖锐地指出:“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中,治理有时被当成‘统治’使用,那意思仿佛是在市场取向的私有化社会中‘统治’已然找不到买主,而治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是指一种‘重新发明’的、经营管理较前为佳的管理形式。所谓治理,就是要充分发掘订立合同、授予经营之权以及采取新的管

理形式等方面的潜力。简而言之,就是别的人所说的实行新公共管理的办法。”<sup>⑫</sup>

第二种观点认为统治是一个上位概念,而治理属于下位概念。雷纳特·美因茨(Renate Mainz)认为“统治指一种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行动能力以及实现过程,治理是一种社会协调模式或秩序,它是统治的具体实现模式”。<sup>⑬</sup>国内学者张康之等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模式,从漫长封建社会时期的“权治”、“人治”到近代国家的“法治”、“技术治国论”,再到当前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多元治理”的“共治”模式。<sup>⑭</sup>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治理是一个上位概念,而统治属于下位概念。最有力的论证来自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他雄辩地指出“治理与统治并非同义词,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sup>⑮</sup>著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也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但该委员会也倾向于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理的强制性会越来越弱,这可以从它所提出的治理的四项规定性特征中清楚地看出来: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sup>⑯</sup>

第四种观点认为“治理”与“统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谈不上什么上下位关系,毋宁认为“治理”是一个要取代(或将要取代)“统治”的概念。罗伯特·罗茨(Robert Rhodes)就明确指出:

“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目前的用法没有把治理看作统治的同义词,相反治理标志着统治含义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或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sup>①7</sup>用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J. Kooiman & M. Van Vliet)的话就是“治理是统治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作用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sup>①8</sup>我们同意第四种观点,有关统治与治理的区别,可以简单表述为:所谓治理的本质乃是一种合作,它是建立在市场法则、公众利益和社会认同基础之上的,治理的运作机制依赖于合作网络的权威,而非政府的直接性权威,它拒绝单一、自上而下的权力,代之以多元、互动的权力体系。<sup>①9</sup>

## 二、第三条道路与治理理论的困境

辛西娅·阿尔坎塔拉(Cynthia Alcantara)曾正确地指出了治理兴起的五个原因:从唯经济论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同时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sup>②0</sup>其实,从第三条道路的观点看,所谓“治理”无非就是要提倡一种“结构多元主义”(structural pluralism),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中保持均衡,但由于目前国家和市场的力量远远超过社会,因此当务之急是复兴公民社会,就像吉登斯说的那样“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公民文化的复兴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抱负”。<sup>②1</sup>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则在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中指出:第一,治理出自政府,但又不

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第三,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第五,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 and 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sup>②2</sup>这五个论点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竞争,更不是冲突,其中每一论点都涉及某种困难或关键问题。罗伯特·罗茨(Robert Rhodes)进一步指出存在着六种治理模式,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公司治理的治理、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善治的治理、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自组织网络的治理。<sup>②3</sup>他还总结了治理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组织间相互依存,治理包括非国家的行动者,比政府管理范围更广,这意味着模糊了公共的、私人的以及自愿部门之间的界限;二是网络成员间持续互动,目的是相互交换资源以及共同目标的协商;三是游戏式互动,它以信任为基础,由网络参与者依据协商和同意的规则来调节;四是保持相当程度自主性。网络不对国家负责,它们是自组织的。<sup>②4</sup>

尽管“治理”目前被广泛用于公共行政学、管理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等多个研究领域,但无论在理论体系和具体操作层面都还很不完善。梅里安(Francois-Xavier Merrien)认为治理理论的不足之处包括“不能说明非趋同制度而明显低估偏离现象,复古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以专家充当预言家的倾向,以但求表面的方式使用科学方法来掩盖无法证明为无根据的思想”。<sup>②5</sup>正是这些困难足以导致“治理失灵”,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克服困难以达到“善治”(good governance)?杰索普(Bob Jessop)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元治理”(meta governance)概念,认为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需要重新定位角色,应该处于一种既居于中心位置,却又不独断专行。“元治理不可混同于建立一个至高无上、一切治理安排都要服从的政府。相反,它承担的是设计机构制度、提出远景设想的职责,它能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产生,还能协调各种自组

织的不同目标、行动以及后果等。元治理有两个层面,制度上它要提供各种机制,促使有关各方学会彼此之间的功能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战略上元治理促进建立共同远景,从而鼓励新的制度安排和/或新的活动,以便补充和/或充实现有治理模式之不足”。<sup>②6</sup>玛丽-克劳德·斯莫茨(Marie-Claude Smouts)认为有效治理最低限度要求是:第一,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第二,公共机构正确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第三,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资和责任制;第四,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sup>②7</sup>

在梳理了有关“治理”的成果后,我们发现既有研究存在两个突出弱点:第一,形式化程度不高,基本上还停留在“巨型理论”(grand theory)阶段;第二,谈应然者多,实然者少,微观操作性也显得很不够。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密切连带的,从方法论角度看,在“宏观-微观”(macro-micro)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它们构成沟通“宏观-微观”二元对立的桥梁。<sup>②8</sup>那么,有关“治理”的中层理论是什么呢?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嵌入性”(embeddedness)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因为它能很好地处理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 三、嵌入性视角下的治理变革

1. “市场-社会”之间的嵌入性关系。从本质上看,嵌入性理论乃是一种能动性(agency)理论,它是对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问题的一种折衷性回应:它宣称自己既反对古典经济学的“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ed)假设,又反对古典社会学的“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假设。嵌入性理论主张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在他/她所属社会类别赋予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转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sup>②9</sup>但是从实践层面看,嵌入性理论的主要论辩对手是经济学,尤其是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

场神话而提出的,“嵌入性”之父——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就曾指出“人类的经济行动往往都是隐藏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体系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当中,经济牢牢地附属于整体社会是其本质所在,市场与农户经济、互惠和再分配一样,不过是经济的诸多模式之一”。<sup>③0</sup>

新经济社会学大师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深化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他批判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结构的本体性,从而化约了复杂的人性,提出市场中的经济行动必定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观点,指出大多数经济行动紧密地嵌入于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嵌入性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所有的社会行动及其后果一样,经济行动及其后果会受到行动者双方关系以及整个网络关系的影响,人际网络、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在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应更多地在社会性背景中进行”。<sup>③1</sup>按着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尽管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有显而易见的不同,我们仍可注意到一个有巨大的理论重要性的反讽:两者都共同地具有通过原子化行动者而实现的行动和决策概念。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导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性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行为模式业已内化,因而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影响的事实”。<sup>③2</sup>无论如何,只要嵌入关系存在,那么两种极端的行为假定都可以抛弃,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被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可能是单纯的原子化行为,而是明显地带有社会化特征,同时由于经济行为仅仅是嵌入,而不是一体化,那么个体行为就不会等价于相应的社会行为。

2. “国家-市场”之间的嵌入性关系。很明显,“嵌入性”是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展开分析的,但并不止于此,国家也被纳入其分析视野之中。波兰尼就敏锐注意到“现代性”(modernity)可以被理解为市场从“嵌入”社会,再到“脱嵌”(dis-embeddedness)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开始从社会脱嵌,其地位由边缘移至中

心,并反过来侵蚀社会空间,于是市场逐渐湮没了社会,市场不仅整合了人类的生计领域,甚至还整合了社会本身,导致真正的社会空间日渐狭窄。<sup>③</sup>总之,对于脱嵌的市场,波兰尼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社会错位(dislocation)下畸形的市场与社会关系,人性自身的价值被诋毁、抹煞,交换价值至上的理念得到宣扬并被实践,其精髓和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的铁笼”、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一样,都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种现代性诊断。在这一点上,格兰诺维特的贡献是区分了“强嵌入”(strong embeddedness)和“弱嵌入”(weak embeddedness),他认为个体经济行为的社会特征取决于嵌入的程度,如果是高度社会化的,那么个体原子化色彩就少很多,社会关系的作用更强些,如果是低度社会化的,则个体原子化特征就更突出,社会特征就更少些,但总的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嵌入社会的程度在逐渐消弱。<sup>④</sup>

那么,市场是如何从臣服于社会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呢?答案是国家的力量。波兰尼就认为“19世纪后期,市场开始脱嵌于社会,但这是以与国家政治媾和在一起为条件的,政治运作和制度安排为市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对于市场来说,国家维系市场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是必要条件,市场社会即便产生也只不过是政治的创造,更准确地说,是在民族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之下所形成的,并非自发生”。<sup>⑤</sup>诚如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所言“国家市场不是自动建立起来的,它只有在政治活动家,特别是政府的帮助下才能建成,要想完全了解市场类型的演化,就必须将政治因素与经济利益一并考虑,甚至连国际市场也是有意识的政治设计的产物”。<sup>⑥</sup>藉此启发是:国家既来源于社会,也潜藏于市场,这无论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所谓自由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也不存在完全脱嵌于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嵌入政治的市场经济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sup>⑦</sup>

3. “国家-社会”之间的嵌入性关系。相比作为政治权力的国家的而言,社会的面貌却一向

有些模糊不清,因此要厘清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首先需要澄清“社会是什么”,亦即社会的本质问题。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社会(civil society)乃是一种包括从行业协会、工会到政党的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及公民在其中形成其政治偏好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sup>⑧</sup>而在经济社会学那里,格兰诺维特把社会理解成由各种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将以两种方式影响行为的活动和结果:一是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它以双边交易的质量为基础,表现为交易双方重视彼此间的需要与目标的程度,以及在信用、信任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为;二是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它关注一个组织在整个网络结构中所处的位置。<sup>⑨</sup>

至于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问题,历来就存在“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洛克(John Locke)认为社会先于国家,并决定国家,黑格尔(Hegel)则认为国家高于社会,但国家应保护社会。<sup>⑩</sup>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坚持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分立的看法,认为社会是国家的对立面,只有在反对国家文化和政治霸权中才能发展起来。<sup>⑪</sup>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特别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而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强调社会的作用。<sup>⑫</sup>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摒弃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二元对立”,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等观点,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sup>⑬</sup>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主张国家与社会之间要努力避免零和博弈,嵌入性视角则为其提供了可能性。按着祖金(Sharon Zukin)和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观点,嵌入性本质上就是一个它包含着“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认知嵌入”的综合概念,<sup>⑭</sup>简斯·贝克尔特(Jens Beckert)也指出嵌入性乃是一种决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认知的结构,因此行动者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是不可分割的。<sup>⑮</sup>这些真知灼见都在提示我们,国家与社

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双方通过广泛互动与协力活动( act in concert) 完全可以创生出某种长期的合作机制。

####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嵌入性”的视角重新梳理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联互动,它表明必须依据经济嵌入社会的独特方式,以及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来寻求可能的治理解释。这种三角分析法有助于我们跳出狭隘的一维决定论,避免将特定社会发展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某个单一治理要素,就像经常见到的那样,无论归因于市场的力量,亦或国家的强大。反之,我们密切关注的是市场和国家如何以及为什么结合?以及在市民社会中,什么样的机构和实践活动能够维持市场和国家间的生产合作?<sup>④⑥</sup>

注:

-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 ②【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 二十世纪的历程》,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 ③【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 ④【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⑤⑦【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⑥【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 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⑧⑬⑲⑳㉑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⑨【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 ⑩⑪⑲⑳㉑㉒㉓㉔《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
- ⑫Hood, Christopher.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1, Vol 69:3-19.
- ⑬张康之、李传军《公共行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页。
- ⑮【美】詹姆斯·N.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 ⑯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Our Global Neighbourh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
- ⑰Marsh, D., Rhodes, R., eds, 1992,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52-653.

- ⑱Kooiman, J., Van Vliet, M., 1993, *Gover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 *Managing Public Organisations*, edited by K. Eliassen and J. Kooiman. London: Sage, p. 64.
- ⑲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 ⑳【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 ㉑【美】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4—97页。
- ㉒⑳㉑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 91.
- ㉓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 46, p. 272.
- ㉔Polanyi, K.,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ited by Karl Polanyi, Conrad Aresberg and Harry Pears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 ㉕【瑞】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 ㉖㉗符平《嵌入性: 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 ㉘④⑥【美】斯梅尔瑟、【瑞】斯威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 ㉙【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 ㉚Granovetter, Mark., 1992, "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edited by Nitin Nohria & Robert C. Eccles. Cambri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pp. 23-56.
- ㉛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载邓正来、J. C. 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 ㉜【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 ㉝【英】马克·尼阿克里尔斯《管理市民社会》,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 ㉞李姿姿《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学术界》2008年第1期。
- ㉟Zukin, S. & P. DiMaggio, 1990, "Introduction", in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edited by Zukin, S. & P. DiMagg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6.
- ㊱简斯·贝克尔特《经济社会学与嵌入性: 对“经济行动”的理论抽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宁岩)

(下转第79页)

## The Reform of Governance in the Third Way: An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Hu Wanjin & Tong X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thony Giddens , Governance should beyond left and right with the rising of the Third Way , which is not only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to our traditional management pattern , but als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te , market and society from the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 and to promote a kind of embedded – structural pluralism governance pattern.

**Key words:** governance; reform; embeddedness